

内容提要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提出经济落后的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列宁把目光移向东方更落后的民族，指出“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国家，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贡献是：（1）从中国革命的内部关系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论证了中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2）提出并实践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具体解决了以何种社会形式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并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的问题；（3）领导中国人民通过和平改造的途径，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把中国推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4）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一步探索了当社会主义已成为经济落后国家不可否认的事实之后，如何弥补上这类国家所缺少、而为了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又不能不具备的生产社会化、现代化条件的问题。这些，就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天才设想，变成了系统理论和伟大现实。当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更为艰巨的任务，而只有当这一艰巨任务完成之后，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理论才是被最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几个决定性步骤的胜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也一定能圆满实现。

经济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革命洗礼并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社会和革命发展学说的重要观点之一。对这一理论观点的运用与发展，在中国共产党70年的历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它既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进行指示了正确方向，又为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提供了思想武装。因此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研究的一个课题，本文对这一问题的发展脉络作些粗浅考察。

(一)

马克思晚年几次论到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对俄国可否“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①而进入更高一级社会形态的问题，作出回答。

1877年10月，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做出错误的解释，硬说马克思是在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发表不同看法^②，硬要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③。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批评了米海洛夫斯基的企图，阐述了自己的原则看法。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但是，《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途径和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历史运动的论述，并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如果想把它当作“万能钥匙”，去理解一切历史现象，“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即使“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也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④在这篇通讯中，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但它却清楚地告诉人们：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历史发展的考察，必须根据“不同的历史环境”，不能硬套“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各民族并非都注定必须经由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道路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881年2月，另一民粹派活动家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希望马克思说明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和世界各国是否“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问题的看法。马克思对这个在俄国民粹派革命家中影响颇大的问题的回答，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他四次拟稿，最后一稿舍去了前三稿中的大部分内容，只作了极为简短而又未包含任何肯定性意见的答复。综合这四个稿本的内容，可概括为：在俄国，仍然遍布全国的农村公社，具有向新的公有制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与它同时存在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⑤的历史环境；如果俄国的革命能够阻止对农村公社的破坏性影响，保证其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起点。

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对上述思想做了更明确的表达：“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⑥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便把俄国能否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不仅与俄国本身

的革命联系起来；而且进一步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即把它变为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个问题。

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马克思关于俄国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没有实现，俄国农村公社未能避免马克思预见的另一条道路——“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俄国社会迈入了资本主义的途程。这正如十余年后（1893年）恩格斯在《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所说的：“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象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态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并且起着样板的作用。……但是西方当时却处于停滞状态，不打算实行这种变革，而资本主义倒是越来越迅速地发展起来。”这样，俄国的农村公社就不可能发展为与之“相隔许多中间历史阶段”、“甚至在西方也还没有成熟”条件的那样一种生产形式，而只能“向资本主义发展。”^⑤恩格斯的最后结论是：只有“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即有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之后，落后国家才可以利用原有“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⑥恩格斯这里表达的意思，一是东方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必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战胜了资本主义，从而为东方提供了榜样和支持之时，才有可能；二是有了上述条件之后，落后国家也只能是“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径直迈入社会主义。这同十多年前的看法有了重大变化。

马、恩关于俄国和东方落后国家是否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阶段的论述，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他们把本来所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前景，从西方扩展至东方，从资本主义国家扩展至前资本主义国家，把社会主义变成了全人类共趋的历史阶段。第二，他们至少指明了西方走过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历程，并不是东方落后国家也必须亦步亦趋地效仿的，各国进入社会主义会有不同的途径。第三，马克思在19世纪80年代初关于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预想，尽管没有、也不可能变为现实，恩格斯后来对此也作了修正，但对东方的共产主义者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马克思去世30多年后，1917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乘帝国主义列强拼死厮杀的机会，在俄罗斯大地上建立起来。从此，在世界上有了如同恩格斯所说的可以“起着样板的作用”的“更高的社会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重新提出经济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说法究竟对不对”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国家，“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⑦

同马克思19世纪80年代初的预想相比，列宁把目光从俄国移向了东方更落后的民族，同时，他不再把希望寄托于原有社会组织的生命力的发挥上面，而是寄望于那些落后国家本身的进步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已取得革命胜利的先进国家的帮助上面。这是对马克思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重要发展。然而，列宁的论述依然是一个设想。他指明，“必须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不可能预先指出。实际经验会给我们启示”。^⑧这个“不可能预先指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解决了。

（二）

中国共产党对超越资本主义阶段思想的接受、理解和运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党创建伊始，就在中国高举起了共产主义旗帜，宣告自己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而奋斗。但是，这在当时，还只是一种从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而产生的美好理想，至于在中国要经过怎样的步骤才能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可否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等问题，那时还没有深入思考和解决。

党成立后不久，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懂得了中国革命要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道理，并经过“二大”制订了民主革命纲领。这时，有关第一步革命的前途问题，即民主革命胜利后由谁掌权，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成了党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来如前所述，列宁在1920年就已明确指出过，落后国家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当中国共产党依据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制订民主革命纲领时，对列宁上述思想并未能立即接受过来。这时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是：“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①“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②“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③

随后，伴着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思想的逐渐明确，中国共产党相继提出建立“革命平民政权”、“革命民众政权”、“革命民众合作统治”、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等主张，而否定了经过国民革命建立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的观点。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党内对民主革命前途问题，仍然存在着模糊的认识。1926年9月陈独秀写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是这种模糊认识的集中代表。该文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不会有“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的事，那时“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这一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④这里，陈独秀仍然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中国必须经过一个民族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阶段，然后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谁主张跳过资本主义阶段，谁就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

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前途问题，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认真探讨。1926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根据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报告做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突出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该决议指出：虽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结果并非一定要造成导致国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前途。”^⑤当时共产国际虽然也预计到了帝国主义将会采取各种方式来干涉和消灭中国革命，但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估计却十分乐观，以为北伐军的进一步胜利，就会导致战胜帝国主义和争得中国民族的独立。基于这样的形势分析，并根据列宁的有关论述，共产国际把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并对国际决议作出解释。中央政治局承认：过去“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即“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截然划分为毫不衔接的两个时期”，而按共产国际的决议，由于中国的国民革命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快崩坏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开始发生”的国际环境中，革命的性质“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革命的主要成分是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劳苦群众”，所以，“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即经过不断的努力，“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

应该“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看做整个的中国革命，”“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够机械的将他画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命运，准备还有第二次革命”。^⑤政治局鉴于这一问题关系重大，要求在全党范围进行讨论。

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决议的解释及随后在全党展开的讨论，提出了如下观点：第一，由于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内部具有的条件，在革命胜利后可以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即“行向社会主义”的前途。第二，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经过国民革命就建立了工农革命政府，所以在国民革命后不需要再进行“自己来革自己的命”的第二次革命了，“国民革命之胜利，就是社会主义之初步。”^⑥第三，所谓“非资本主义前途”，既是指革命后的发展方向，又是指含有特定内容的历史阶段。“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但不是经过一个资本主义时期，而是经过一个建立在非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时期，”^⑦这是中国“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中间阶段”。在这个阶段，政权是以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民主专政。”^⑧经济上并不立即完全废除私有财产，只是“于全国国民经济有关的大产业，将要限制私人资本经营”，至于“无关全体国民经济的产业”，不仅让给私人经营，而且将保证其发展，但趋势是“渐渐减少私人资本剥削的程度”，^⑨“私有财产将在非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渐地废除”。同时，要发展现代产业，使国家经济“上升到一个适当的水平”。^⑩这样，“渐渐地经过非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渐渐地走向社会主义。”^⑪第四，实现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根本保证，是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如果“资产阶级取得领袖权”，那么，中国革命就会“毁灭民族改良主义之手，其结果是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仍旧受帝国主义的支配”；反之，“无产阶级取得领袖权”，就会“使中国的革命彻底的实行民族民权的职任，其结果可以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⑫而无产阶级领导权，又必须靠无产阶级政党运用正确的战术去努力争得。

以上四点，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把超越资本主义阶段思想运用到中国所取得的早期认识成果。应该指出，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实现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条件，国民革命在获得进一步发展之前就夭折了，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这次讨论的理论意义，它把列宁的有关论述具体化了，对解决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当然，这时的认识，还不可能是十分深刻的，并且，在克服以往“二次革命”论错误观点的同时，又出现了“一次革命”论的偏颇，这就是由瞿秋白所代表的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直达”论：中国革命“应当从国民革命生长而成社会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⑬

如果说，在1927年以前，否认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可能的“二次革命论”，一直存在于党内；那么，1927年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一次革命论”，就成为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这种观点不断在党中央领导人中出现。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认为，“中国革命是由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根本上不能在民权主义的阶段上再成一个段落。”^⑭“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⑮党的“六大”否定了“无间断革命”论，对革命前途作出基本正确的解释：由于中国革命的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且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又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就建立起来”；由于世界资本主义正处在恐慌时代，而社会主义苏联的力量正在增长；由于工农民主专政“可以成为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出发点”，所以，“就可

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使它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只有斗争和力量，才能决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要到什么时候完成”，以及“将要怎样快地经过那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②这里既指明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的、亦即社会主义的前途，又指出了这一前途是将来民主革命阶段完成之后的发展道路，它要有一个革命转变过程，而不是一次革命直达而成。所论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的条件，除对革命动力的认识存在明显的不足外，大体也是正确的。但是到立三路线时期，又重犯混淆革命阶段的错误，认为革命在一省与几省的胜利，就是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两个革命“中间决不会有丝毫间隔”，“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③这又否定了革命的阶段论和转变论，恢复了“无间断”论和“直达”论。而从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乃至在1927年至1935年的整整9年的时间内，都一直视民族资产阶级为革命的敌人之一，把反资产阶级与反帝反封建并列起来，进行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左”倾观点，固然排除了中国革命的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但也给民主革命的进程造成了严重障碍。

(三)

经过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两起两落，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同时，斗争的实践，也推进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解。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特别是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党对以往的革命路途进行了又一次反思。同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反思相比较，这次反思由于有了更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基础，并且同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尤其是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原理相结合，而达到了更为深刻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党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认识渐趋成熟。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即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落后国家经过民主革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问题，得到了科学说明。

还在1937年8月，毛泽东即从矛盾同一性这一哲学原理的高度，回答了“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等问题，他归结为一点：“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否则一切都不可能。”^④那么，中国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而“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的具体条件是什么呢？毛泽东反复讲了这样两条：第一，中国目前的革命虽然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⑤即：中国的革命已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的民主革命改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主要依靠工农两个阶级的力量来完成的新式的民主革命。第二，中国革命是处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是受到社会主义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援助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第一条表明了国内阶级关系和革命主要成份的变化，第二条表明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有了这两方面条件，就使得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避免资本主义前途，不仅具有了可能性，而且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

应该说,对这两方面条件,在毛泽东之前,党的不少文件和领导人的著作也都有过论述,但毛泽东的论述就更加明确和深刻。而毛泽东对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理论的最重要的贡献,不在这里,而是他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社会主义毕竟要有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呢?如前所述,大革命后期共产党人曾提出过非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的设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时期,把国民革命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创造性地提出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③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毛泽东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政治,就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实行代表大会制的国家制度;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要确立起由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据领导地位的、实行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两大原则的新的经济关系;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④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根据地,都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⑤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内,要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使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以便“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⑥在这个过程中,也就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物质条件。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中,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发展之路,清晰地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这里包含了两个“两步走”的思想。其一,是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⑦“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⑧其二,是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经济文化前提,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完成以后,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以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⑨当年马克思关于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设想,以及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设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中,变成了科学的实施方案。

正式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到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又有进一步发展。作为中国革命伟大成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将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要从各个方面“调剂国营经

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即是临时宪法，它把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各项基本政策，用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共同纲领的制定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标志着落后国家在革命后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在中国变成了伟大的现实。

(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新中国在短短三年时间中，取得了多方面成就：祖国大陆全部解放，实现了多年来人们所盼望的国家的独立和统一（除台湾等沿海岛屿）；国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能够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3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进行了土改，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稳定了市场物价，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管理，工农业生产恢复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上升到26.7%；取得了两次限制和打击资产阶级非法活动斗争的胜利，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巩固地确立起来；各种经济成份的比重发生很大变化，1952年同1949年相比，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的比重已由26.3%增至41.5%，私营工业由48.7%减为30.7%，而私营资本主义工业中又有一半左右被纳入不同形式（主要是加工、订货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农村中有40%左右的农户加入了互助合作组织，同时，在相互比较中，社会主义经济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而资本主义经济则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它的局限性和无法克服的矛盾；经济工作的成就、各项大的政治运动的开展、民主建政工作的进行，使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加强。

以上情况显示了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它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合作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社会。第二，它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提高社会生产力，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整个国民经济在不断地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运行。社会主义经济所占的比重日渐加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所占的比重日渐缩小，并且被日益纳入国家可以控制的轨道；个体经济也在逐渐地被引上互助合作的道路。这种社会秩序，显然是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而非资本主义的。但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基础是被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而对一般资本主义采取了利用、限制的政策，所以又可以做到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设想的那样：既避免资本主义制度而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

以上成就的取得，不但使革命后的中国避免了资本主义前途，而且也更为明确地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又依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某些观点和苏联的经验，经毛泽东的提议，1953年党中央正式确定和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改变了原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与部署。按照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中国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和文化，以便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前提，采取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要待二三十年以后。而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从现在起，就要一步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说，把原来设想的创造条件和采取重大步骤的两个阶段，合并成了一个阶段——过渡时期。这是一个重要

的理论观念上的改变。但是，总路线所规定的“一化三改”任务、18年左右（连同恢复时期的3年）时间、和平过渡方式、逐步实现的原则等方面内容，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又是衔接的。因此，既可以把总路线看作是不同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关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又一设想，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延伸和发展。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即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全国的确立，标志着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理论在中国取得了第一步胜利——中国走上了非资本主义的和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总路线的提出，又把新中国在这条道路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本身的合理性，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展开。改造过程中涌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但是，历史的发展绝不是径情直遂的，常常会出现变态与曲折。到1955年夏季以后，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情绪迅速增长起来，急于求成代替了正常发展，改造高潮淹没了稳步前进。本来设想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时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在不到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而其中大部分任务和关键性步骤，又是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中完成和走过的。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把所有制改造问题上求纯、求一的观点推向极端，提出要使资本主义和小生产在6亿人口中国“绝种”的观点。结果，在三大改造这一伟大事业基本完成的同时，众多的困难和问题也遗留下来。群众的觉悟水平，干部的管理能力，规章制度的建设等等，都难以适应所有制急剧变化和生产组织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生产社会化程度更不足以满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需要，而所有制的趋向单一化和改造过程中对私营企业和个体手工业的大裁大并，又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活跃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多方面需求。对这些问题，中央领导人很快有所察觉，并为解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然而，探索刚刚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成果还未来得及巩固，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远离社会主义原则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又接连发生，这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很大的弯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理论遇到了行得通还是行不通的新的考验。

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之上，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⑧，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又确实是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完成的；一般说来，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准备的，但是，解放前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条件又使解放后的中国决不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按照原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以便使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一个相当的水平，然后再采取步骤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三大改造高潮又使这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提早结束了；这样，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就不能不放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来完成，但是，三大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又没能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以致“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⑨，而在同一时期，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却利用种种机缘，实现了经济上的起飞。这些情况不能不推动人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实即中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问题，进行再认识。

实际情况表明，三大改造完成后20年中国社会发展迟缓的原因，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由于实际工作中的失误。即：没有做到如同列宁所说的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到社会主义的首要地位，而是把社会发展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不断搞阶级斗争和变更生产关系上面。邓小平说：中国经济建设的“停滞”，“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

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④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决定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三中全会后，党领导全国人民紧紧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加快了我国前进的步伐。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理论得到进一步说明和发展。其集中表现，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阐述。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对此作了更全面系统的论述，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肯定了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同时指出：第一，当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仅仅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仅是不能超越的，而且必须经过上百年的时间。它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第二，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第三，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第四，要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支持一部分人和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把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建国指导思想加以回顾和比较，不难看出，初级阶段理论既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吸取了营养，又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直接发展，它把落后国家在革命后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所探索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已成为这类国家不可否认的事实之后，怎样弥补上它所缺少、而为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又不能不具备的生产社会化、现代化条件的问题。应该说，只有把这个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更为艰巨的任务完成后，落后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才是最后被完全证实了。

落后国家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而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社会实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取得这项伟大实验的几个决定性步骤的胜利。一是以新民主主义

的社会形式避免了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把中国引进了社会主义社会；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在指引中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奋进，而建设现代化的蓝图也已绘就。中国革命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典型；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取得了足以使人类史册增辉的伟大成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初关于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一定会在十多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中最后完满实现。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6页。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有卡夫丁峡谷，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此击败罗马军队，并强迫其通过“牛轭”。

“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一、三两稿中，几次使用“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一词。

②③④⑤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30、129—131、451、32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503页。

⑨⑩《列宁选集》第4卷，第336页。

⑪《中共“二大”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77页。

⑫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

⑬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2号。

⑭《向导》第172页。

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78页。

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2—13页。

⑰⑱⑲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第696、699、695页。

⑳罗易：《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罗易赴华使命》，第226页。

㉑㉒罗易：《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同上，第232、229页。

㉓㉔彭述之：《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六大以前》，第791页。

㉕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27页。

㉖《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同上，第370页。

㉗《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同上（4），第171页。

㉘《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同上（6），第93页。

㉙《矛盾论》，《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306页。

㉚《青年运动的方向》，同上，第527页。

㉛㉜《新民主主义论》，同上，第632—633、669页。

㉝《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同上，第743页。

㉞《论联合政府》，同上，第982页。

㉟《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同上，第254页。

㊱《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同上，第614页。

㊲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8页。

㊳㊴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23、22页。

㊵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同上，第33页。